

新时期甘肃小说创作略论

叶淑媛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联合大学人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内容摘要】新时期甘肃小说创作既取得了重要成就,又存在明显的缺失。本文从创作意识、学识修养和地域因素三个方面观照新时期甘肃小说创作的得失,为甘肃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提供一定的理论启发和参考,其作为一个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个案研究,也为当代小说创作提供借鉴,以促进当代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甘肃小说 创作意识 学识修养 地域因素

中图分类号 J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8-0101-04

新时期甘肃文学创作跨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纵向比较,这个阶段甘肃小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进步显而易见:其一,长、中、短篇小说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完善,作品数量剧增,质量不断提高,并产生了享誉全国文坛的标志性作品。比如邵振国的《麦客》荣获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柏原的《喊会》荣获1987—198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两篇作品成为甘肃文学进军全国文坛的标志。叶舟的中篇《羊群入城》获2008年度人民文学优秀中篇小说奖,雪漠的长篇《大漠祭》入围茅盾文学奖提名和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等多项奖项,它们都赢得了全国性的赞誉。此外,还有一大部分优秀小说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达到了一定高度,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其二,小说的题材和主题得到多方面的拓展。由最初的乡土小说一支独大到现今的乡土小说、都市小说、知识分子小说、大学生小说、女性小说、反腐小说、历史小说、科幻小说。以至武侠小说等多题材、多层面的展示,拓展出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在作家们的妙笔之下,历史的风云、时代的变迁,人性的温暖和诡异,现代意识烛照下的文化反思等等,都得到了尽情的表现和深入的主题挖掘。其三,艺术手法的多样性表现。现实主义文学的写实手法仍然受作家们的青睐,但在传统写实中融入了象征、意识流、魔幻等因素,显示出现实主义的开放性。现代主义文学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也成为一些作家的追求,与之相应的各种艺术表现手法也得到了有效的运用。比如打破传统的情节结构模式,转而和心理结构方式的运用,时空交错的情绪化叙述,从重视典型人物转向偏重营造意象,进而以两者的融通表达小说意蕴,小说文体和形式的探索……总之,在艺术手法上的多样化追求表现出作家们可贵的创新意识和艺术探索精神,也常常显示出作家的才情和个性。

不过,从横向比较,甘肃文学与全国和西部兄弟省市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在中国当代小说的整体格局中,甘肃小说不占主要地位,仍然在全国主流文学之外,影响力并不大。从全国来看,新时期小说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潮流,而且每个流派都产生了享誉全国文坛的代表性的作家与作品,但这其中少有甘肃大作家和有影响力的精品。与西部兄弟省市相比,甘肃小说的整体实力也不足,虽有个别作家的优秀之作显示了甘肃小说的创作实绩,但作为团体的“文学陇军”尚未形成冲击文坛的风采和实力。可以说,甘肃小说兴盛与缺失相伴,成就和局限并存。因此,正视新时期以来甘肃小说的成就与缺失,总结新时期以来甘肃小说创作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认真深入地探讨问题的真正症结,提出具体可行的对策,使甘肃文学摆脱被动境地,获得新的突破,是现实而迫切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新时期甘肃小说作为探讨对象,主要以甘肃小说创作中大家比较关注的问题为中心,来探讨甘肃小说的成就与缺失。影响甘肃小说创作的因素很多,对其深有体会的当属小说创作的主体——作家以及致力于甘肃文学评论的评论家。因此,就甘肃小说创作的成就与局限这一问题,笔者对甘肃多位作家和评论家进行了调研。文章在对这些调研观点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分析新时期甘肃小说创作的成就和局限,以期甘肃小说创作提供一定的理论启发和参考,为甘肃小说的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促进甘肃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健康发展。此外,还应该看到,甘肃文学虽然不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但其存在的问题却具有普遍性。因此,对甘肃文学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研究,比研究一个有突出成绩的文学大省(比如陕西省)更有普遍价值和学术意义。这对总结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经验教训,建立科学的批评范式和标准,抽象和凝练文

* 本文为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改革开放30年甘肃文学的成就与局限研究”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叶淑媛(1975-)女,兰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读博士生,甘肃联合大学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

学理论成果,乃至促进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也应该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理论及实践意义。

一、创作意识

一个作家要写出怎样的作品,首先与创作意识有关。创作意识关乎作者怎样看待文学,怎样看待创作,能写怎样的作品。创作意识与作家的文学观、价值观和写作日的紧密相关。以心作笔,真情实感,写出自己对世界对生活最敏锐最深切的感受,这是一个作家最基本的写作意识。在这方面,甘肃作家亦不乏优秀者。王家达以作家的良知,对人民的热爱,饱含忧愤之情剖析时代变迁中知识分子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所谓作家》以作家为核心,“旁及社会方方面面,触角深入到人和事的灵魂和核心,有力地分析了带来知识分子命运巨变的病灶,剖析了阴暗和力量,暗示了社会要发展必须抛弃的东西。”^[4]雪漠提到《大漠祭》的写作意识,他说“我只是想平平静静告诉人们(包括现在活着的和将来出生的),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一群西部农民曾这样活着,曾这样很艰辛、很无奈、很坦然地活着。”著名作家徐怀中将军对雪漠的创作精神给予高度评价,他况:“十年磨一剑只是一个传说,但却是雪漠文学事业的真实写照。以十几年时间,反复锤炼一部小说,没有内心深处的宁静,没有一番锲而不舍的追求,没有一种深远的文学理想和赤诚,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今天的文坛,太需要这种专心致志的创作态度。我劝大家读一读《大漠祭》,你会被西部农民生存境遇的真实性深深打动,你会体会到它跟充斥图书市场的文学快餐不同的品格,也会重温文学给予我们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审美体验。”范文的《红门楼》也值得一提,范文孤心苦诣的写作意识和文学追求超越了对自身的顾影自怜,而是用心体察生活,深刻思考时代、国家、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红门楼》潜入现实和历史激流深处,试图触摸和剖析时代的、民族的精神内核,探讨儒家道德这个大命题,敏锐地指儒家道德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失落的社会原因,以及儒家道德自身的局限性,显示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艰难和中国人道德建设的困惑,并在当下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国学热”的倡导之中,提供了一个反观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之不足的视角,提出了儒家道德在当下有多大的现实可行性的命题,也提出了当下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建设的难题。邵振国的长篇新作《若有人兮》,是浸透人生体验、多年潜心创作的重要收获,作品以甘肃某地一个村子在20世纪后半期发生在几个家庭的故事为描写对象,却以小见大,在中国社会特殊历史时期的背景下拷问人性,又以人性的坚守与颓败、升华与裂变来思考社会的深层问题,突破了阶级、政治层面和地域局限。张存学执着于先锋小说的艺术探索,不仅醉心叙事形式的实验,而且也注重生命存在意义的追问,写下了《轻柔之手》等具有稳定的叙事风格和较高的艺术水平的作品。当然,甘肃还有许多小说作家,比如老作家柿原,新一代作家王新军、叶舟、弋舟、任向春、唐达天、马步升等人的优秀小说都表现出作家们所具有的良好写作意识,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良好的写作意识体现在作品中,作品会表现出对现实生活准确敏锐的把握,贯注深厚的文化内涵,体现出文学对人类灵魂的净化和拯救,对人类生存和命运的关怀。

反之,对社会的关注不够,感受不敏锐,思考不深入,换句话说就是不能深入生活。再加上精神世界浮泛,不能以诚立心,写作功利性过强。就会导致相应的闭门苦写与盲目跟风的写作方式。闭门苦写似乎是心态沉潜了,不浮躁了,问题是没有大的眼光和视野,作品的境界和格局就上不去,而且往往会与时代脱节。虽然经常说作家要强调创作个性,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也是文学发展的规律。紧跟时代又不被时代淹没的关键就在于对时代、社会和人生感受的敏锐性与深刻性。作家们本来比一般人更敏感,对社会的关注面应该更宽广,对世界的洞察力应该比别人更深刻,但如果作家们的眼光闭塞,拘泥于一个封闭的文化圈,不能敏锐地把握生活,出好作品就难。盲目跟风的本质是媚俗,什么类型的作品在市场叫好,就跟着写什么。这本来比别人慢了一拍,又因为学养不够,心态浮躁,更难写出好作品。这两种不良写作方式在甘肃作家中一定程度地存在着。弋舟指出:“先锋文学的勃兴,是30年来中国文学的一次重要事件,但在这个事件中,甘肃的文学创作基本上是缺席的,尽管先锋如今已余韵难在,但那种文本意义上的训练却不可或缺,而甘肃的文学,恰恰是落下了这节课,在创作中,意识、手法,不免都囿于陈旧,并且难以自省。如今市场大潮汹涌,热衷于跟风式的写作,更是使得作家们难以执著于文学本质意义上的探求,这些,都导致了甘肃文学的滞后。”尔雅说:“作家必须有清醒的意识和开放的眼光,否则写作会失去意义。”不过,甘肃之外,当代作家中闭门苦写者并不多,倒是花样翻新的媚俗化、跟风式写作成为文坛风气,即使一些成名了的大作家也难免俗,我们更应该警惕和反省的是跟风式的写作意识。

二、学识修养

作家的学养是关乎小说内涵和境界的重要因素。甘肃大部分作家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都有清醒的认识。从文学创作对主体的要求来说,作家的学养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作家的学识修养。也就是写作活动中所需要的知识、学问、见识等方面的要求。写作的过程也是学识的组合和应用过程。作家的基本功是对文字知识和语言知识的掌握,因为思想的光辉得之于强有力的语言。语言失去张力和灵性,思想就会失去元气,作品也就没有了生气。此外,作家对其他方方面面的知识也有所涉猎,特别是哲学、美学、文史、民俗知识要尤其深厚。深厚的哲学、美学和文学素养,再加上创造性的语言文字组合和表达能力,能够给作家的生活体验赋予丰富深邃的内涵,从而进入到更高的创作层次和艺术境界,形成作品脱俗不凡、博大隽永的艺术世界。反之,知识的贫乏会使作品的内容贫乏。学识不够,自然难以形成深刻的思想。邵振国指出:“甘肃作家们知识结构和素养欠完善,自发性多于自觉地艺术创造,缺乏对题材的深度思考,缺乏形而上性。”尔雅说甘肃小说的“一个问题是写作者的学养不足。很多作家不读书,忙于写作之外的事情。甘肃本来就是一个缺乏文化积淀的地方,如果不通过大量的阅读来弥补,还能写出什么样的好作品?而且我也不认为我是一个好的小说家,但至少我还有清醒的认识。”这应该是尔雅写作的切身体会。因此尔雅在写作中多了自觉的艺术创造。

他的“《蝶乱》以大学校园生活为舞台和社会缩影,将人生体验、现实感受和哲理思考意象化,获得了多义性主题和多层次内涵。在话语形象层面,通过老旦、老梅、寒子介等具体的人物形象与姬瑶这一不确定形象的塑造和相斥关系的描写,透视一个时代一群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指向,表现了社会转型期人的欲望、堕落、放纵自我和精神裂变,揭示了特定情势下寻求自由与文化规范之冲突;在意蕴层面,通过精神之‘乱’及其悲剧性的展示完成了精神的升华,表现了诱惑与成长之关系以及对战胜‘堕落’的思考,获得了人在被诱惑和堕落中成长的形而上的哲理意蕴。艺术上的整体意象色彩,具有先锋意识的叙事策略,似真似幻的故事情节和寓言式隐喻,丰富的想象力和充分的虚构性,诗性特质和简约有力的语言表达,构成小说奇谲飘逸的美感风格和耐人寻味的精神内涵,也蕴涵进行多种意义阐释和引发争议的可能。这是一部思想高度和美学高度兼具、追求象外之意、富有艺术锐气的优秀长篇小说”。^①

第二,作家的境界品位。说起来,“文如其人”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当然“文如其人”也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作家的气质与作品的风格之间有对应关系;二是指作家的人格境界往往影响作品的格调。风格没有优劣之分。格调源于作者的思想观念,就有高低之别。境界和情怀高妙的作家,作品的格调也就高。叶燮说:“诗之基,是人之胸襟是也。有胸境,然后能载性情、智慧、聪明、才辨以出,随境发生,随尘即盛。”(《原诗·内篇》)孔子讲“文德”,孟子讲“养气”,韩愈讲“气盛言宜”,陆游讲“文不容伪”等等,都是要求作家正其心、诚其意,胸襟开阔,抱负远大,情思旷达。当然,这个问题也很复杂,作家的境界品位与作品的格调之间不一致的情况也常见。不过,格调高的作品中,作家必然对人类生存状态有深切体验,其间也必然贯注着对人类命运发自内心的悲悯和人文关怀,这样的真诚必然会提升作品的境界和格调。这也是文学创作中的普遍规律。

作家在境界上不能超脱名利,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叙事精神的萎靡、人文关怀的缺失、审美和艺术水平的粗鄙。这个问题是当代文学的痼疾,多年来没有良方。甘肃作家不可避免地也存在,但甘肃作家有清醒的认识。雪漠说:“甘肃作家最缺的,是‘舍’和‘修炼’。”“甘肃作家正是在这两点上没有的突破,所以,许多人一直跳不出自己,跳不出自己的生存环境,所以很难出现大的格局。”“所有作家,在完成基本的文学训练之后,拼的就是人格了。”“甘肃作家现在最缺的,还是心灵境界的高远和博大。”王新军说:“我的小说创作中,我始终在证明着自己是一个重视心灵提升的人。”张存学说:“说到底,甘肃的文学创作者们在目前最大的不足是精神上单一和浅显。修炼不足,精神上的抵进能力不足,使得甘肃的文学创作者们缺乏定力。也是甘肃的文学创作者们难以在更深层面上、对当下人的最迫切的精神状态难以说话。”董汉河也指出甘肃文学难出精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底蕴和修养欠缺。实际上,相对于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大部分甘肃作家还是能够抵御名利的诱惑,实实在在地写作,大部分作品体现出作家的良知道义和人文关怀。这也是甘肃小说难能可贵的一个方面。甘肃作家在精神境界上

真正的不足,是眼界不够开阔,大气概不足这一点。

第三,作家的艺术把握能力。说到底,作家的学养最终要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小说是一种艺术,其成功很大程度上更要依赖于作家的艺术把握和表现能力。所以,有些学养相当高的学者不一定能成为作家,原因就是缺乏艺术把握能力。对一个作家来说,具有较高的艺术把握能力是他的学养之中的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它体现着作家的艺术创造性的高低。艺术把握能力牵涉到作家的心理素质、个性气质、艺术悟性等这些先天的禀赋,但也与后天对艺术规律的把握有关。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过,艺术创作的核心动力是想象力。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认为:“艺术的源泉是一种强烈深浓的、不可遏止的情绪,挟着超越寻常的想象能力。这种由人性最深处发生的情感,刺激着他直觉到普通理性所不能概括的境界,在这一刹那顷间产生的许多复杂的感思情绪的联络组织,便成了一个艺术创造的基础。”^②作家应该驰骋自己的想象,看重精神的超越和自由,这是创造新颖丰富的文学世界的一个正确途径。以当代作家为例,余华说他要寻找新的表达方式,以挣脱日常生活经验围困的想象力,构造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的“虚伪的形式”。苏童说:“我没见过妻妾成群的封建家庭,我不认识颂莲、梅珊或者陈佐千,我有的只是‘白纸上好画画’的信心和描绘旧时的古怪的激情”,“我的创造也许只在于一种完全虚构的创作方式。”^③在这里,拥有生活的多少已不是主要的方面,而作家对于生活的感悟以及由此而生发出的艺术创造力,则上升为最重要的东西。用思想创造无限的艺术生活,源于作家神奇的想象力。甘肃大部分作家属于“生活型”作家,生活积累比较深厚,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得心应手,创作也取得了较大成功。但在面对不熟悉的生活,或者生活素材较少时,就会力不从心。陈德宏说:“想象力的缺失是我国作家的‘通病’,甘肃作家尤甚。究其原因,主要是长期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误解、曲解、独尊,以及对现代主义的拒绝。到生活中找素材找原型,只能在某一点上激发作家的灵感,而由‘点’扩展到‘面’——人物的塑造、情节的设置、矛盾的发展、细节的描绘……总之,创作的提高与完善,主要靠想象,想象力是作家必备的基础条件。作家要注重写什么,更要注重怎样写。实事求是地说,甘肃作家的想象力不足的问题比较严重,与全国相比也有较大的差距,这一点必须正视。”

艺术把握能力还体现在语言表达能力上。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已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通识。不过,许多作家在怎样创造语言艺术方面并没有自觉的清醒的意识。陈德宏指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我们的许多作家并没有真正读懂并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内涵。生动、形象、准确、鲜明,只是文学语言的基本要求,而其内核则是创新与创造。……伟大的作家都是语言大师,他们对历史的贡献,当然不局限于对已有语言的使用,更在于他们对语言的创造、创新、丰富与发展。”尔雅也说甘肃“有些作家的天分不错,但缺乏更好、更敏锐的发现能力。小说其实就是发现。还有个问题就是想象力和语言能力的匮乏。当然这样的问题中国的大部分作家都有。”甘肃小说作家中,语言表达能力值得

赞赏者也不乏其人,邵振国、工家达、雪漠、尔雅、王新军、叶舟、任向春、弋舟等人的小说,高度的语言表现力和语言美感赋予了小说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也给读者以阅读的快感和享受。

三、地域因素

关于文学创作的地域性,是研究甘肃小说创作得失时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地域性“主要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特定地域的社会现实、生存状态、文化传统、风情民俗、自然风物、独特题材、语言特点等属于创作资源的内容;二是指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创作意识、表达方式等带有特定地域性的文化品格和特点。前者关系创作客体,后者关系创作主体。这两方面的有机契合,可以成为文学创作的优势,借助于这些优势可以取得某些特殊的成果,创造出具有地方特色和风格、反映特定地域文化精神的作品。但是,这不应该是文学创作追求的最终目标,真正的高水平高质量的地域文学,应该既有地方内容、地域文化精神又有普遍意义和人类精神。”^[4]小说的地域化特色在小悦语言的运用上有明显体现。成功的地域化语言往往既有地域的原生态特征,又是经过作者巧妙改造,具有普遍的汉语表意功能,是人人能够读懂并体会到其传情达意之妙的语言。以雪漠的作品为例,“《猎原》和《大漠祭》都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即追求语言的原生形态。作者非常熟悉西部民间尤其是甘肃凉州一带的民叫话语,通过对方言俗语、土话乡音的巧妙化用,大大激活了汉语的表意功能,提高了作品的艺术魅力。我们读雪漠的小说,往往会产生一种原创的感觉,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语言的功劳。那种贴切地道,那种鲜活生动,那种韵味,是令人拍手叫好的。在中国当代作家中,像雪漠这样对民间方言充满信任,并乐此不疲地吸收和探究的作家,已经不多见了。”^[5]小说的地域化特色更重要的体现是地域性与人类性精神的相通。邵振国的《麦客》、《买驴》,柏原的《喊会》、《天桥腰岬》等作品具有浓郁的陇东和陇中风情,以风俗画的形式展示出黄土塬上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更可贵的是揭示他们的文化意识与生命意识,其间饱含着作者的人文情感关怀,作品无疑是感人的,成功的。甘肃小说作家雪漠、范文、王新军、补丁等人的作品也实现了地域性的借重与超越。他们的作品已经成为当代中国西部小说中必不可少的、亮丽的风景线。

甘肃也有部分小说不能超越地域性局限。有些作品方言土语过多,熟悉这个地域的读者读起来会觉得亲切有趣,走出这个地域就造成了阅读困难,甚至给人留下生涩、粗俗、土硬的印象。如何让小说语言既有地域的生动活泼,又能流畅高雅,为大部分人欣赏,是地域性写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甘肃小说更难以超越地域性的是,作家写不出世界性。雏青之说:“地域性要写出世界性,才是作家的水平。小说作家如果就地域写地域,没有折射力,写甘肃的农民生

活,东北的农民可能看不懂,就不要说世界性了。”在地域性中写出世界性,实现地域性与人类性的统一,最主要的途径是作家从思想和艺术修养方面进行潜心修炼和提升。

结语

对新时期甘肃小说进行总体观照,可以发现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缺失也是明显的。以上三个方面是对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及其创作的作品文学的剖析与思考,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是甘肃小说在未来的发展中自身必须进行调整和提高完善的方面。此外,也应该看到,全国文坛对甘肃小说成就的认识也在些偏差,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甘肃小说的实力和成就,特别是近年来甘肃小说呈现出的强劲的发展势头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这些都是制约甘肃小说形成更大的影响力的因素。其中的重要原因是甘肃小说评论话语权的缺失。创作与评论是文学缺一不可的两翼,二者之间应该形成良好的互动。但甘肃本土文学界的学者致力于甘肃文学评论的不多,国内的文学评论家对甘肃这块土地的了解有些“隔”和“生”,但“甘肃的文学创作更多地受制于主流评价系统的左右”(张存学语)。主流评价系统对甘肃文学的关注不够和甘肃文学评论自身建设的不充分,造成甘肃文学在全国文学中一定程度的“失语”。又比如,甘肃媒介业不发达,有好作品也难以迅速地被推介,难以较快地赢得读者。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许多作品被读者熟知,恰恰是媒介造就的“文学事件”或者借助于影视剧的播演。这里面有浮躁和媚俗的成分,这是坚守纯文学高贵的精神应该警惕的。但在另一方面,在这个电子媒介的时代,媒介对文学的影响力确实不能忽视。在坚守文学精神的同时,如何处理好文学作品与媒介传播的互动,也是甘肃小说发展中应该思考的问题。还有,地方政府加大对文学创作的鼓励和投入,扶持和组织一支文学队伍,进行有组织的亮相和冲锋,也是促进甘肃小说进一步发展的有效途径。上升到国家层面上来说,要发展民族文学并走向世界文学,对那些在精神世界里默默地探问,传承人类文明,建构民族精魂,为人类寻找精神家园的思想者,也都应该给予重视。

注释:

①《蝶乱》获2004年甘肃省“黄河文学奖”一等奖评语。

参考文献:

- [1]杨光祖.良知的写作[N].兰州晨报.2003-2-12
- [2]宗白华.美学与意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20.
- [3]苏童.婚姻即景·自序[A].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1.
- [4]程金城.地域性的借重、突破与超越——论长篇小说《雪葬》[J].飞天,2003(08).
- [5]唐瀚存.爸凉的人漠深处的声音[EB].中国作家网 <http://www.chinawriter.com.cn/>